

# 经济增长的迷雾

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

[美]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著

姜世明◎译

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

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经济增长的迷雾**

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

[美]威廉·伊斯特利 (William Easterly) ◎著  
姜世明◎译

*Economist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in the Tropic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增长的迷雾：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 /  
(美)伊斯特利著；姜世明译。—2 版。—北京：中信  
出版社，2016.7  
(比较译丛)  
书名原文：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Economist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in the Tropics  
ISBN 978-7-5086-6357-9

I. ①经… II. ①伊… ②姜… III. ①发展中国家 –  
经济增长 – 经济政策 – 研究 IV. ①F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4460 号

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by William Easterly.  
Copyright © 2002 by MIT Press paperback edition.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with MIT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经济增长的迷雾：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

著者：[美]威廉·伊斯特利  
译者：姜世明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0 字数：296 千字  
版次：2016 年 6 月第 2 版 印次：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3-7668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号：ISBN 978-7-5086-6357-9  
定 价：5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

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钱颖一

2015年7月5日

\* Dani Rodrik, “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19631, 2003.

在过去的 30 年中，经济增长再次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热门研究课题。在理论上，“内生增长”理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经验实证方面，新的思路、新的数据和新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将对增长的实证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比如，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传统变量外，经济学家也把有关地理的、开放的、制度的、法律的、政治的，甚至文化的变量包括在增长模型中。又比如，在数据分析中使用工具变量方法用以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应该说，今天人们对经济增长的知识比 30 年前大大提高了。

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领域无论从关注的问题到研究的方法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发展经济学的热点研究方向是发展战略，思路中政府干预经济的色彩浓厚。后来这些“大战略”多在实践中失败。这导致 20 世纪 80 年代后，发展经济学转向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微观问

题。比如农户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信贷市场的失灵和补救等。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小心求证，结论更为严谨，但多与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关系不大。在 90 年代以后，部分地受到转轨经济的影响，发展经济学重新回到研究重大问题，比如制度、政府和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影响。

伊斯特利《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这本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的研究成果。它研究的是穷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减少贫困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主题。几十年的经验表明，扶贫是一项艰巨和困难的任务。事实表明，仅仅出于好的动机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好的动机还可能引出坏的结果。比如，单纯地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资金和外国援助并没有达到好的减贫效果，反而增加了腐败。本书的出发点是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福利至关重要。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本书所引的经验证据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学家根据对 65 个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数据的研究，发现高速的经济增长导致贫困率快速下降，而经济衰退则导致贫困率上升。比如，如果一国的人均收入每年下降 9.8%，那么该国的贫困率每年增加 23.9%。反之，如果一国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长 8.2%，那么贫困率每年减少 6.2%。因此，GDP 增长并非像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神话，GDP 不仅对一国的发展有益，对减贫也非常重要。

在这一前提下，本书展开对穷国的经济增长的分析。由于作者长期在世界银行——世界上最大的以扶贫为目标的国际组织——工作，对国际上主流的政策思路和实施有着直接的了解。同时作者又是这些政策的批评者，这更增加了本书的分量。除了通俗易懂外，在使用的方法上这本书有两大特点。第一，全书紧扣增长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概括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贡献。从 20 世纪 50 年代古典增长理论的索洛模型，到 20 世纪 90 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罗默模型，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对其主要思想结合穷国的现实做了讲解。无论是批评还是褒扬，作者都是以准确地理解理论为出发点的。第二，作者引用大量的经验实证分析的结论，用数据论证这些理论的适用性。不少理论推出的政策性结论被事实推翻。由于计算机的普及和新的数据的搜集，对数据的仔細分析形成近年来研究增长和发展的主题。本书在方法上的这两方面都会对我国的读者有启发。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在这两方面还有相当的距离。我

们的一些研究往往对理论不深究，浮于表面，对理论的逻辑推理不够准确。在事实检验上，我们有的研究不看数据，有的研究即使用数据，也常流于简单的数字，缺乏对数据仔细深刻的分析和解释。这本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告诉我们如何做到分析应有理论，理论要有检验。

本书用理论指导，让事实说话。它有两大主线。首先，本书尖锐地批评了一个又一个的所谓启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这些药方大多是从经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政策。但事实证明它们大多在现实中是无效的。本书对这些药方，包括增加外国对穷国的援助、增加国内投资、提高教育水平、减少人口、与改革挂钩的外国援助、外债减免等一一做了分析。从对数据的分析上看，它们都没有起到提高穷国经济增长的目的。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经验（empirical）问题。

为什么呢？作者认为这不是经济学的失败，而是没有很好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则的失败，这就是有关人的激励问题。这构成本书的第二条主线。作者认为，激励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的激励。如果外援落在一个腐败的政府中，它当然不会提高增长。如果外债减免给予政府今后可以得到更多贷款的激励，这种减免也不会对增长有益。其次是私人部门的激励。如果私人部门从“寻租”中获得的好处大于从生产中获得的好处，那么这种激励将指挥他们致力于重新分配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在不少国家，表面上看似对穷人有利的福利政策，反而成为对穷人努力的惩罚，因为一旦他们经努力脱离贫困，便失去了福利。第三是援助者的激励。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它们往往有其他的目的（政治目的、生存目的，等等），与受援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这就使得援助的效果受到影响。

从对这三个方面的分析，作者的结论是没有“把激励搞对”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那么“把激励搞对”是不是又一服灵丹妙药呢？作者认为它只是一个经济学原则，而不是一剂处方。把这一原则付诸实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实施。这正是本书作者认同的所谓“增长共识”。经济增长和扶贫问题具有全世界的共性，具有一般性的规律。中国自然也在其中。“把激励搞对”既是我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没有“把激励搞对”也是目

前许多问题的症结。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坏政府往往是经济增长的杀手。那么什么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坏的政府呢？作者发现多利益集团下的弱政府往往导致“共有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因此产生坏政府。这是因为缺乏共识，多元化集团组成的松散联盟更可能采取“杀鸡取卵”的经济政策，摧毁私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本书通过事例说明，这种情况在多种族的国家（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和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国家（如拉美的一些国家）更容易产生。

《经济增长的迷雾》这本书对关心增长和减贫问题的读者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虽然它没有分析中国的情况，但由于中国面临类似的问题，它对我们非常有启发。阅读这本书，使我们可以领略经济学理论的魅力和经济学家对数据的实证分析的力量，从而理解政策制定的初衷和结果之间的真正的关系。我希望这本书对思考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减贫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钱颖一

非常高兴为本书的中文版作序。我在 2003 年 12 月访问了中国，并且受到热情款待，那里的充沛活力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工作，到处都在修建新的高楼大厦，我见到的所有人、所有事都非常高效。令我惊讶的是，北京居然有五条环路（而且六环路也已经动工），要知道，华盛顿仅有一条环路，还永远堵车。来听我做讲座的学生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他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吸收大量的知识。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取得高速增长时，我们不应过分自信。对中国来说，她面临着贫富差距和制度变迁的巨大挑战。也许中国经济中的泡沫终将破裂，也许中国经济将继续强劲增长，但是所有这些都阻挡不了中国成功地实现其内部变革。

一些西方机构试图将中国的成功归为自己的功绩。如同早先的传教士和现代主义者致力于拯救中国一样，世界银行也将中国视为重点关注对象。世界银行宣称，

“来自外部的支持不仅推动了改革的发生，而且帮助设计了具体的改革架构”。世界银行的建议对于中国理解如何进行自由贸易和“港口自由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的“农村发展项目”使得中国明白应该“把反贫困的目标集中在贫困最普遍的地方——农村”。这些努力起到了“重大的支持作用”，使中国的农村人口贫困率从1985年的34%下降到1998年的18%<sup>①</sup>。但实际上，世界银行用于中国的资金非常有限——2002年的援助金额只有5.63亿美元，摊到每个中国人头上大约每天1/10美分<sup>②</sup>。

很显然，不管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将导向何方，当今的西方援助与过去西方力图拯救中国的幻想一样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这反而说明了本书将要描述的援助模式只不过是空谈，因为中国所获得的援助金额仅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4%，而且中国并没有向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调整援助贷款或者债务减免。在我看来，中国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了希望，那就是尽管本书所描述的西方式发展模式都失败了，但是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仍然可以依靠其内生的经济力量来获得成功。

威廉·伊斯特利

① Goldin、Rogers 和 Stern (2002)，第ix页。

② <http://lnweb 18.worldbank.org/eap/eap.nsf/Countries/China/42F2084B942D74C685256C7600687DBF?OpenDocument>

非常感谢罗斯·莱文 (Ross Levine) 和兰特·普里切特 (Lant Pritchett)，他们对本书的草稿给予了评论，并且在数次关于经济增长的讨论中提供了大量真知灼见。我同时还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 (MIT) 出版社的编辑们所提供的评论，感谢五位匿名评议人，感谢阿尔贝托·阿莱西纳 (Alberto Alesina)、礼萨·巴吉尔 (Reza Baqir)、罗伯塔·加蒂 (Roberta Gatti)、理查多·奥斯曼 (Ricardo Hausmann)、查尔斯·肯尼 (Charles Kenny)、迈克尔·雷默 (Michael Kremer)、苏珊·拉比纳 (Susan Rabiner)、塞尔吉奥·雷贝洛 (Sergio Rebelo)、塞尔西奥·施穆克勒 (Sergio Schmukler)、迈克尔·伍尔考克 (Michael Woolcock)；感谢本书所引用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合作者，他们令我受益匪浅，包括米切尔·布鲁诺 (Michael Bruno)、尚塔·德瓦拉扬 (Shanta Devarajan)、戴维·多拉尔 (David Dollar)、艾伦·德拉泽恩 (Allan Drazen)、斯

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鲁米恩·伊斯拉姆（Roumeen Islam）、罗伯特·金（Robert King）、阿尔特·克赖瑞（Aart Kraay）、保罗·莫罗（Paolo Mauro）、彼得·蒙蒂埃尔（Peter Montiel）、霍华德·帕克（Howard Pack）、乔·里森（Jo Ritzen）、克劳斯·施密特—赫布尔（Klaus Schmidt—Hebbel）、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霍尔格·沃尔夫（Holger Wolf）和戴维·尤拉夫里夫克（David Yuravlivker）；感谢美国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有关经济增长研讨会的组织者，他们是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查尔斯·琼斯（Charles Jones）、保罗·罗默（Paul Romer）、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阿尔文·扬（Alwyn Young）；感谢在乔治城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研讨会和高级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参与者，感谢我讲解本书部分内容的课程的参与者。当然，对于本书的观点，作者独自承担责任。

寻宝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许多故事都与此有关：金羊毛、圣杯、仙丹。但是，在大多数故事中，法宝往往虚无缥缈或者即使得到也令人失望。伊阿宋依靠美狄亚的帮助取得了金羊毛，为此美狄亚不惜背叛自己的父亲。但是，他们随后的婚姻并不美满，伊阿宋背叛了美狄亚，拜倒在另一个公主的石榴裙下。美狄亚失望至极，于是杀死了伊阿宋的新娘和自己的亲生孩子。

50年前，二战刚刚结束，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了热切的寻宝之旅，我们希望可以找到灵丹妙药，让热带雨林国家也能像欧洲和北美的富国一样富有。穷国人民的苦难和富国人民的享乐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激励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如果能够成功，这将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辉煌。

同过去的寻宝者一样，经济学家试图找到一个法宝能让穷国变富。许多次，我们都认为已经找到了灵

丹妙药，从外国援助到直接投资，从扶植教育到控制人口，从根据改革状况提供贷款到根据改革状况减免贷款，不幸的是，一切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那些接受我们药方的穷国并没有取得意料中的进步。在我们最花力气的地区——非洲撒哈拉，经济根本没有增长；拉丁美洲和中东一度曾有增长，但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重新陷入贫困的陷阱；南亚是另一个备受经济学家们关注的地区，无规律的经济增长使那里聚集了大量的贫困人口；最近，东亚，我们曾为之欢欣鼓舞的经济新星，也陷入了增长泥潭（一些国家但并非全部国家正在复苏）。除了热带雨林贫困国家，我们还试图将一些做法应用于前社会主义国家，但结果也非常令人沮丧。

就像很多宣称找到仙丹的无稽之谈一样，我们经济学家常常试图兜售一些违背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方案。问题不在于经济学的失败，而在于不能在政策制定中正确运用经济学原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一个年长的智者曾经告诉我：“每个人只会去做有回报的事情，赔本的买卖没人去做。”斯蒂芬·兰德斯伯格（Steven Landsburg）曾经写过一本很好的书：《摇椅上的经济学家》（*The Armchair Economist*），他对这一原理作了更简洁的概括：“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其他只是补充而已。”

在过去 20 年里，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如何对激励做出反应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私有企业、个人、政府官员甚至是援助者如何对激励做出反应。研究表明，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会在个人层次上对政府官员、援助者、私有企业和家庭有所回报。激励常常引导他们通往与促进生产相反的方向。我们这些事后诸葛很容易发现，过去那些包治百病的药方（其中一些还在应用）对穷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多少不幸的误导。

为了找到脱贫之路，必须记住：每个人只会去做有回报的事情。如果能够努力确保第一世界的援助者、第三世界的政府及其普通民众三者都具有正确的激励，那么经济发展就可实现，否则就是缘木求鱼。我们会发现，如果遵循那些违背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主张，这三方往往不会有正确的激励，预期的经济增长自然也无法实现。

这个故事听起来令人沮丧，但也不是没有希望。我们现在已经有统计上的证据支持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药方失灵以及基于激励的政策如何发生作用。

激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促使其走向繁荣之路。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正确的激励本身并不容易获得。我们将会发现援助者、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激励错综复杂，构成一个难以解开的网络。

而且，由于经济学家的努力收效甚微，人们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失望和不满。从西雅图到布拉格，抗议者要求完全抛弃所有的努力。这当然是不可取的。只要穷国的人们还在遭受瘟疫、压迫和饥饿，就像我在本书开头提到的那样，只要通过人类的智识能够找到通往富裕之路，我们就应该放弃努力。

在开始正文之前，我希望指出以下四点。第一，本书的观点仅仅代表我个人，而不代表我的老板——世界银行。有时候，我甚至会对老板的做法说三道四。不过，我对世界银行有一点是钦佩的，那就是她鼓励像我这样的讨厌鬼享受思想自由，而且并不压制对其政策的内部争论。

第二，我并不想涉及环保问题。在本书最初的草稿中，我试图讨论一下环保问题，但发现自己实在讲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经济增长如何影响环境是一个重大课题，但对此的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明智的环保政策可以缓解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副作用，比方说让排污者承担对人类福利造成不良后果的成本，所以我们并不需要通过放弃经济增长来保护环境。这种观点的确不错，因为停止增长对穷国来说将会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在第一章将对此加以讨论。

第三，我并不想对所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做一个综述。过去十几年中，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保罗·罗默（Paul Romer）和随后的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带动下，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非常热门。然而，对于某些问题，在学术上仍未取得共识，当然有些观点大家也已经普遍接受。本书的重点将放在如何让穷国变富上。

第四，在各章之间，我将会加入一些小插曲，提供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快照，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醒我们：在寻求增长之路的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欢乐和苦难，正是为了他们，我们经济学家才要“上下求索”。

“比较译丛” 序 // XI

序 言 // XIII

中文版序 // XVII

致 谢 // XIX

引子：寻宝 // XXI

## 第1篇 经济增长为何重要

### 第一章

帮帮穷人 // 003

无辜的死亡 // 006

富有与健康 // 007

穷人中的穷人 // 008

穷人的肚子 // 009

无情的压迫 // 010

增长和贫困 // 011

探索之路 // 013

小插曲：寻找河流 // 013